

M2增速放缓 4月金融数据回落

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

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,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.47万亿元,其中超五成贷款来自于企业贷款增长。而与上年同期相比,4月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2293亿元,与2019年同期相比则多增4525亿元。

分部门看,住户贷款增加5283亿元,其中短期贷款增加365亿元,中长期贷款增加4918亿元;企(事)业单位贷款增加7552亿元,其中短期贷款减少2147亿元,中长期贷款增加6605亿元,票据融资增加2711亿元;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532亿元。

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,对比2020年同期数据,2021年4月人民币贷款增速与增量均有所放缓,住户部门贷款以及企业贷款增量也存在较大差异。而环比2021年3月数据,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.73万亿元。

从新增贷款结构上看,住户贷款和企业贷款两大板块中,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额度差异环比有所增大,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有所提高。2020年4月,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总增长比重为58.44%,2021年占比为78.39%。

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看来,2021年4月人民币贷款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放缓,主要是受2020年“高基数”影响,由于疫情这一特殊情况,国内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。

周茂华指出,从住户信贷稳步增长、企业中长期贷款表现强劲、近两年新增信贷均值明显高于2019年等方面来看,国内信贷环境仍保持适度宽松格局。这也反映了国内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强劲,预示国内经济有望延续复苏势头。

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直言,不必过多关注与去年同比数据,与2019年等正常年份相比,4月信贷规模增长能够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。中长期贷款新增占比提高,新增人民币信贷结构优化,表明了货币政策加大

2021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出炉。5月12日,央行官网披露2021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。数据显示,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.47万亿元,同比少增2293亿元。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.85万亿元,较上年同期少1.25万亿元。广义货币(M2)与狭义货币(M1)增速进一步放缓。业内人士分析认为,4月金融数据增速不及预期,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减,预计后续央行将灵活利用多种政策工具,应对短期因素的扰动。



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支持力度。

新增社融、M2增速回落

社融规模方面,2021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.85万亿元,比上年同期少1.25万亿元,比2019年同期多1797亿元。其中,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.28万亿元,同比少增3399亿元;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272亿元,同比多减1182亿元。

在货币供应方面,数据显示,4月末,广义货币(M2)余额226.21万亿元,同比增长8.1%,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.3个和3个百分点;狭义货币(M1)余额60.54万亿元,同比增长6.2%,增速比上月末低0.9个百分点,比上年同期高0.7个百分点;流通中货币(M0)余额8.58万亿元,同比增长5.3%。当月

净回笼现金740亿元。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,此前市场预估的数据来看,新增社融以及M2增速均低于市场预期。对于这一情况,温彬指出,M2增速同比回落,一方面在于2020年疫情期间,央行加大了市场流动性的投放;另一方面则在于财政存款增长较快,政府债券集中发行节奏加快,且4月为缴税大月,货币回笼力度加大。

周茂华分析表示,去年特殊时期国内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,今年货币政策以稳为主,最终使得4月M2下滑。但从近两年月底均值看,2021年1-4月M2增速均值同比均高于2019年,显示国内货币环境仍保持适度宽松。“但数据也提醒‘市场,特殊时期的‘宽松环境’已经过去’。”

另一方面,数据显示,4月,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、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

112.61万亿元,4月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.01%,与上月持平,比上年同期高0.9个百分点;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.96%,比上月低0.05个百分点,比上年同期高0.85个百分点。

温彬认为,当前市场流动性依旧是合理充裕的,市场利率保持平稳,M2的流动性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,也满足了实体经济的需要。而社融回落也与当前维护宏观杠杆率稳定的要求一致。

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

4月金融数据不及预期,也引发了市场热议。温彬进一步分析道,整体来看,本月金融数据增速不及预期,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减。

温彬强调,要客观看待部分数据回落,一

是基数效应对M2的扰动较大,如果剔除基数影响,2019年至今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长率为9.6%,基本处于合理水平。二是信贷增量回落但结构有所改善,企业中长期贷款比去年同期多增,居民和企业短期贷款投放相对谨慎;三是金融数据走势整体与当前经济恢复情况相适应,在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,货币政策更偏向于防风险和结构性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。

周茂华同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,信贷社融仍将维持适度宽松格局,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,实体信贷融资需求增加;另一方面,是国内政策不急转弯,继续为经济提供必要支持。

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走势,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,就在央行5月11日发布的202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,央行再次强调,将继续按照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、合理适度的要求,坚持“稳字当头”,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,做好跨周期流动性安排,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,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,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,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,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。

周茂华表示,预计后续市场流动性有望继续保持合理充裕,主要是国内经济仍处于恢复阶段,需要一定力度政策支持;预计后续央行将灵活利用多种政策工具,应对短期因素对资金面的扰动。

温彬则进一步强调称,下一阶段,货币政策将继续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,预计央行将延续等量或小幅缩量续作MLF和每日小幅对冲到期逆回购的方式,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,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。继续强化结构性调节,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、小微企业、绿色发展等的支持力度。在基数效应影响下,未来金融数据仍可能出现波动,但M2和社融增速的整体走势将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廖蒙

F 聚焦 Focus

吉林信托难逃“董事长落马魔咒”

北京商报讯(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)一天之内,两任原“一把手”获刑、被公诉的消息再次将吉林信托推向了风口。从判决信息来看,因贪污受贿行骗等罪,吉林信托原董事长高福波获刑20年;同日,吉林信托原董事长邵戈也因涉嫌贪污罪、受贿罪等被公诉。在分析人士看来,管理层持续动荡,业务开展停滞,也导致吉林信托经营指标持续恶化,如没有外部力量干预,这一态势还会延续下去较长时间,影响到吉林信托可持续经营能力。

吉林信托2021年的日子不好过,5月11日,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公布了吉林信托第二任董事长高福波、第四任董事长邵戈的判刑以及调查结果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高福波犯贪污罪、受贿罪、行贿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,判处有期徒刑20年,并处罚金510万元,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信息显示,邵戈因涉嫌贪污罪、受贿罪、国有公司、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,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,由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

作为吉林省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金融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,吉林信托在2001年3月改制为责任公司之后,一共经历了4位董事长,但4位董事长均被查。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,2007年6月,吉林信托第

一任董事长张兴波因涉嫌受贿罪被捕,后因贪污罪、受贿罪判处死缓。

张兴波落马后,2007年6月第二任董事长高福波紧急继任,后于2015年10月辞职。辞职三年后,2018年12月高福波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、职务犯罪被查。

第三任董事长李伟为高福波继任者,2015年9月接任吉林信托董事长,2017年8月被查,2020年3月,李伟因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,被判有期徒刑五年。在第三任董事长判刑仅6个月左右,上任不过两年的第四任董事长邵戈也同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。

四任“一把手”先后被查反映出吉林信托内部治理的缺失,4月30日,吉林信托发布了2020年度业绩经营数据,报告期内,吉林信托实现营业收入2.98亿元,同比2019年的5.88亿元下降49.32%;归母净利润为1492.8万元,同比2019年的1.91亿元下滑92.18%。

从各项收入来看,2020年,吉林信托实现利息净收入-9370.65万元,较2019年的2.07亿元下降超145%。除了盈利能力下滑,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吉林信托有一项净资产指标已经跌破监管“红线”,从年报数据来看,2020年末,吉林信托净资产余额为98984.48万元;各项业务风险资本之和为95355.3万元,净资产/各项业务风险资本之和103.81%;净资产/净资产为24.82%。

而根据《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,信托公司应当持续符合净资本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之和的100%、净资本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%风险控制指标。吉林信托净资产/净资产指标为24.82%,这一比例已经跌破监管划定的标准。

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,吉林信托管理层持续动荡,业务开展停滞,历史问题留存较多且很多尚无具体解决时间表,导致公司经营指标持续恶化。其中净资产指标无法达标,会持续延长该公司新增业务的暂停时间,从而导致亏损进一步加大。如没有外部力量干预,这一态势还会延续较长时间,影响到吉林信托可持续经营能力。

吉林信托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短板显而易见,根据年报,银保监会吉林监管局于2020年6月23日至7月31日对吉林信托开展了综合性现场检查,并于检查后下发了《现场检查意见书》。吉林信托方面则根据《现场检查意见书》制定了整改方案,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,强化股东股权管理工作,完善内控措施,完善相关管理制度、相关审批内容及流程,提升业务合规性;持续加强尽职管理,提高自主管理信托财产能力;加大监管意见落实力度,加强责任追究等。

针对业绩经营下滑、净资产指标跌破监管“红线”等问题,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多次致电吉林信托年报披露的联系电话进行采访,但电话始终未有人接听。

正式启动IPO 湖北银行上市还有多远

北京商报讯(记者 孟凡霞 马嫡)成立第10年,湖北银行正式启动了A股上市辅导程序。5月10日,湖北证监局官网发布的《湖北辖区拟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辅导工作基本情况表》显示,湖北银行位列其中,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。

2010年初,湖北省委、省政府决定在原宜昌、襄阳、荆州、黄石、孝感五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,采取新设合并的方式组建湖北银行。2011年2月27日,湖北银行正式成立,总部设在武汉。

对于奔赴资本市场,湖北银行已规划多年,2015年,该行正式启动上市前期各项工作,并于当年年报中披露了上市意图,宣告与股东初步达成“先启动H股,再择机回归A股”的共识。而后,2018年年报中该行五年发展目标再次提及要“五年上市”。

对于如今湖北银行A股IPO率先传出实质性进展的消息,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表示,湖北银行上市规划多年,属于湖北省内对城商行资源整合的重要布局,势在必行,前期考虑到湖北银行的实际情况,A股上市难度较大,所以计划先通过对上市要求较低,且已经有不少同类城商行已挂牌的H股上市,来完成初步融资目标,这也是很多情况类似的银行的选择。只是随着A股注册制的推进,后续直接A股上市的可能性也在提升。

值得关注的是,当下A股排队IPO的竞争对手林立,湖北银行想要顺利上市还需迎战诸多考验。业绩方面,截至2020年末,湖北银行的资产总额为3044.68亿元,同比增长16.09%。但过去一年,湖北银行营收、净利润双双下滑,营业收入为78.21亿元,同比减少2.27%;净利润为15.53亿元,同比减少20.78%。对于业绩下滑,湖北银行在年报中解释为:受疫情影响,贷款营业收入出现一定程度下滑。

从收入构成来看,利息净收入为湖北银行贡献了营收的主要来源,2020年该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94.13%,投资收益占比3.22%,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2.4%。资产质量方面,截至2020年末,湖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

2.49%,同比上升0.5个百分点;拨备覆盖率为165.19%,同比下降22.29个百分点。

自筹备上市以来,湖北银行股权历经更迭。天眼查显示,目前湖北省宏泰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持有湖北银行31.24%股份,为该行第一大股东,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持有该行30.63%股份,为该行第二大股东。根据该行2020年年报,两大股东的实控人均为湖北省国资委。另据公开消息显示,在2017年和2019年,该行原第一大股东长江三峡集团、原第三大股东湖北能源集团先后转让了所持股份,由湖北国资接盘。

同时,该行股东阵列也经历了“大换血”,与2015年年报对比,在2020年年报里,该行原第一大股东长江三峡集团、原并列第一大股东湖北能源集团2018年财报显示其为并列第三大股东)、原四股东宜昌市财政局、原七股东武汉华森塑胶公司、原十股东黄石市财政局已不在前十大股东行列。而湖北宏泰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、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、宜昌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、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公司入围前十大股东行列,分别位列该行第一、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八大股东。此外,该行小股东股权也频繁更迭,在拍卖平台上多次转让。

“湖北银行近年来股权频频更迭,看起来更多的是内部资源整合,优化股东结构、提升市场化水平、加强业务协同、提升湖北银行运营水平的举措,对上市的影响偏正面。”廖鹤凯如是说道。

随着股权结构持续优化,湖北银行正式开启上市进程,能否如期达成其在2018年年报中提及的五年上市目标也备受市场关注。

廖鹤凯指出,因为此前设定的最低目标是H股上市,这个目标的达成障碍不大,不论是A股还是港股IPO,湖北银行要想顺利实现上市,更多的还是需要加强内控;对业务结构做一定的调整,止住下滑的态势,提升利润水平;加强风控和资产处置力度,控制住不良率上升的势头。

关于上市规划和筹备进展等问题,北京商报记者联系湖北银行,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。